

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刘明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国，我们需要有更为开阔的世界视野去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国运盛则学术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正获得空前有利的发展机遇和条件。我们要正视目前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努力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当前，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世界史学科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并不是从中国史学科派生出来的分支，它发端于近代“西学东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模仿苏联的专业设置，将世界史与中国史分立，各高校历史系也随之成立了与中国史各学科相对应的世界史方面的教研室、研究所。可以说，我国世界史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还要指出的是，与西方以自己为中心书写世界历史不同，我国的世界史通常是指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就是没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其次，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还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对我国史学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其中最显著的进步是在历史观上的进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历史有规律可循、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重大理论使我国史学的历史观念有了质的飞跃。但在历史研究中也出现了机械、教条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能将唯物史观科学运用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更少。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学者放弃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传承，这导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难以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整体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原因在于一些学者又开始热衷于追捧西方史学理论，如兰克学派、年鉴学派等观点成为时尚的学术话语，一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总是跟着西方史学理论亦步

亦趋。最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尽管在克服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方面付出极大努力，但必须承认，研究某国史的中国学者与该国史学专家目前仍难以在材料掌握和文化认等方面相抗衡，在学术研究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对西方史学的借鉴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借鉴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批判选择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目前，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将理性的批判借鉴升华到自主学术创新层面。新时代，我国世界史研究要进行自主学术创新，不断提升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力，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当务之急莫过于在学术体系上摆脱西欧中心论、西方史学理论的束缚和影响，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西欧中心论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已成为横亘在一些世界史研究者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全球史观说明，他们也意识到以西欧为中心来解释世界历史并不合理。以西欧中心论来考察世界历史，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倾向。比如，将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灭顶之灾的殖民侵略美化为史诗般的“地理大发现”，这显然背离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取向。破除西欧中心论，并不是否定西方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但对于一些谬误则要予以纠正。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要求我国世界史研究者在治学思路要有新突破。研究世界历史不可避免要有一定的视角，而多重视角则可以丰富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我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视角，应该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整体的高度写出自己的世界史，只有这样的世界史才是中国人应该贡献给世界人民的世界史。另外，在世界史中说明中国的重要地位、历史作用，也是中国史家的责任与义务。这就要求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能够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追求中外会通的学术境

界。在许多领域，如果我们能把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进行比较，不仅能够对西方史家的某些理论模式进行纠正，而且会有新的发现与创新，获得西方史家所不能取得的原创性成果。这样，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就不会单方面地只做学生，而是可以与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互为师友、切磋交流了。

充分发挥唯物史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唯物史观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演进趋势。把唯物史观作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优势之一。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的是科学的指南，而非具体的历史答案与阐释模式。过去，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有过将其语录化、庸俗化的倾向，这个教训应当深刻汲取，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要从客观的史实出发，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连续性、丰富性在世界史学发展中无出其右者。中华民族是具有高度历史理性的民族，注重以史为鉴，善于用历史理性在变化中把握真理。西方许多学者看不出中国史部典籍中的思想观点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理论与方法，不理解中国古代史家“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达方式，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虽然历史典籍丰富但史学思想贫乏。还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大程度上蕴含在经学当中。中国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最初史为经之源，史学与经学的密切关系是中国所独有的，也是解读中国传统史学意蕴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我们要以中国学术话语构建世界史学

科的理论与方法，需要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比如，以《易经》的“通变”思想解读历史变动包括制度的因革损益，以《公羊传》大一统思想论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关键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史学界应以开放的态度，有鉴别地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实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以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去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

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何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对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提出的时代任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迫切要求人类的思维和观念来一次深刻革命。新思维的基础是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共存共亡、共荣共衰。顺应时代发展大趋势，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显然突破了西方国家以邻为壑的狭隘视角，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一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世界史研究要深入回答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世界史学科的时代价值。这也将为世界史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



把握好区域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区域史研究正不断拓展史学研究的视角

黄道炫

对一个区域的时候，大都会考虑这个区域在国家、在全球是什么样的定位，对这个区域的研究会有多大的延展性。因为这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以小见大。或者反过来，从全球向国家回归，再从国家看区域，从宏观视角窥探某一区域。在区域史研究中，无论是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虽然路径不一样，但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个区域，进而更好地把握历史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其实都离不开国家视角，需要将国家作为一个参照、一个坐标，从而更好地了解一个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史研究的视角与国家视角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如果真是大视角的一种区域化落实，只是国家视角对某一区域的聚焦和投射，这样的区域史研究不免有重复劳动之嫌。区域本质上是地方，当然这不是地方史表述中的“地方”，而是有着相对稳定的人地关系，在长时段中具有相同运行特征的地方。在区域史研究中，区域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研究主体。一旦我们将区域作为研究主体，研究的视角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开展区域史研究，关键是从区域本身的长时段运行中去观察区域，注意区域的内生特征，发现区域内部的运行机制，特别要重视区域中人的处境、选择以及区域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这样才能真正呈现这个区域鲜活的历史。因此，区域史研究不能仅仅把区域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和概念，简单地把区域作为国家视角聚焦的对象。如果这样，区域史研究就是简单的国家视角的局部呈现，就无法展示区域史研究的独特魅力，也无法体现区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区域史研究强调将区域作为研究主体，但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又要避免另一个误区，即碎片化。这是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必须把握好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区域史研究通常会选取一个点展开，这个点当然应该兼具同质性和异质性。同质性注重某个区

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同之处，这样可以保证以这个区域为基础进行延展性研究，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异质性注重某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相异之处，这样可以使这个区域呈现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追求。问题是，如果仅仅注重同质性，就很难让人看到某一区域研究的特点，因而寻找更多的异质性几乎成为学者在区域史研究中的本能选择。但是，如果学者们都注重区域的异质性，区域史研究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区域就会变成一个个独立分散、各不相同的点，是一种碎片化状态，看不到什么普遍性，这显然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近些年，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对其碎片化的批评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是发人深省的问题。这提醒我们，进一步推动区域史研究需要把握好区域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不宜刻意强调区域的特殊性，更不能抱着寻找奇闻异事的心态来对待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要真正活起来，关键是把人的因素更深入地纳入研究中。区域固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又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现在，一些研究者对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津津乐道，因为在该书布罗代尔以地中海世界的地理时间作为首要的考察对象，把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列于其后。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体现出很大的学术勇气，但毕竟不能成为常态，不能简单效仿。事实上，更多时候是人的活动而不是空间本身规定了某一区域的历史和现实，规定了某一区域和人地、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

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由此可见，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书写的首要前提，研究历史关键是研究历史中的人。对于区域史研究而言，尤其不能简单地把区域作为地理概念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活动在区域中的人。

史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中国传统史学就很重视人物传记。但是，随着史学的发展，人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虽然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史学观念并没有完全忽视人，像西方新史学无论研究制度、研究结构还是研究空间，也都是把人作为考察的基础。但问题是，这些史学研究的人更多还是作为“类”存在，是事件、制度、结构的附着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行动着的木偶”，缺乏主体性。区域史研究关注人，应该让人们看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近年来兴起的新文化史特别注重具体的人的研究，试图通过话语分析、文本阐释、记忆生产等各种途径逼近人的内心、进入人的灵魂，在关于个体生命的讲述中呈现无数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着的人及其世界。每个个体的历史都在讲述着他们自己，同时在动态地讲述着这个世界。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还是近几十年兴起的全球史、新文化史，逼近人的内心，做“有灵魂的历史”都是不可阻遏的趋向。毕竟，历史的世界，首先还是人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史研究要不断深化，也应该关注“有生命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做“有灵魂的历史”，而且区域史研究更有条件去这样做。这是未来区域史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趋向、不断发展的一种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近20年来，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深刻影响着各行各业，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历史文献、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使史料的检索、复制极为快捷和方便，许多未曾阅读过的书籍中的资料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也能够被直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这确实是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需要作细致的探讨和辨析。

史学研究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中国史家传统的读书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为如此，古人割裂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不过，无论类书还是目录学著述、索引，都是以“书”的形式出现，长期以来，治史以读书为根基，无人怀疑和挑战。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可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四部丛刊全文电子版、读秀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已然涵括了过去史家难以想象的资料，而数据库建设仍方兴未艾。从理论上讲，只要解决好操作技术问题，所有资料都可随时提取，速度非常快、史料非常多。而且，数据库还可以由学者自行设计检索内容，这使它实质上已经不同于类书。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直接考辨；第三，受数据库涵盖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具体史料的运用必须依托于对相关历史背景状况的整理解读，决不能依靠史料的堆积而不知鉴别。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认为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就可以轻松治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这是在“名”与“实”之间的失察，而学术资料数据库的检索就是以词语、字串为核心来汇集资料，所以特别需要警惕。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路路不可抛弃，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读书上应作出调整和改进。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史学研究中运用数据检索手段发现的重要资料出自陌生的书籍，就要跟进浏览，这样才能让信息化检索起到促进读书、增益研究的作用。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治史仍需以读书为根基

乔治忠

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深化历史研究

——“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要

顾海燕

为推动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河北省历史学会和邯郸学院共同主办的“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河北省邯郸市举行。与会者围绕民间历史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运用民间历史文献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认为，近年来民间历史文献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近现代中国民间社会的个体文书、家族文书和村落档案等新史料被不断挖掘。这些史料有助于学者从新的角度理解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结构的变迁。在这一背景下，关注底层、自下而上进行历史研究日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这样的研究路径能够与自上而下的历史研究实现相互观照并交相辉映。研讨会上，一些学者还围绕民间历史文献的界定、民间历史文献的修复、如何开展农村调查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对进一步利用民间历史文献推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出了建议。

学术信息